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拜伦传

〔日〕鹤见祐辅著

陈秋帆译

拜伦传

〔日〕鹤见祐辅 著

陈 秋 帆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拜伦传

〔日〕鹤见祐辅 著

陈秋帆 译

责任编辑：江声

装帧设计：王诚龙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8,000 印张：8.625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109·1424 定价：0.80元

编者前言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拜伦传》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其他各本将陆续问世。

—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 (George Gordon Noel Byron, 1788—1824) 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波澜壮阔的诗篇, 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 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 更重要的, 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的反动时期, 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 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希腊, 他被推

举为希腊革命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希腊的独立自由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1885—1973)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1931)，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

穆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篇幅不象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1811—1812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1812年2月27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呢？

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对于同一年(1812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者或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别具“慧眼”或别具肺肝，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但是，对特瑞萨是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革命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领导人的身份。

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牖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伦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惜墨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守派（姑且不说是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

风、不同诗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1816年在日内瓦，拜伦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在1816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1818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铁的事实呢？

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俨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对专制政治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

态度，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他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说吧：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

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1979年版《辞海》和1981年版《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1981年7月

中译本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知道现在传记所达到的确实成就，更不知道对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什么研究。过去虽然也偶尔读过一两本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类的小册子，但是，隔了许多年月，那点儿知识，早已象月下远山的影子一般模糊了。现在来谈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经验作根据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是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士并不难于想象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编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宋文等古典著作。象外国少年人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几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

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 and 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那记述伟大人物的传记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和甘地等人的传记时那种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读《罗兰传》、《雪莱传》和《伏尔泰传》。换句话说，由于罗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茨威格、莫洛亚等名手的作品。而从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于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试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陪他掉泪。有许多事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候是这样，读路德维希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摯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

*

拜伦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国知识界一般人的心目中，总不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那印象从脑海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但是，我们的文坛对这位革命诗人的介绍，却太过忽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或《堂·璜》的译本，甚至连一本薄薄的他的诗歌译集都没有。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么吝惜。我们还没有出过一本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的或译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生平事迹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了急待填补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多少可以算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于拜伦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曾经震撼过欧罗巴的知识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甚至思想上的“拜伦时代”。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些狂风烈火般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着威力，能够激动那些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守旧势力的读者的心灵。大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和可能的事情便够了。比较精细的剖析讨论，且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

去做吧。

谈到拜伦的生平，象这个传记里详细叙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汹涌着惊涛骇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倾倒一世的诗才风貌，放肆和侠义的种种行动，……这些，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人生记录。在这里，没有平凡，没有因袭，没有死气奄奄的沉静。它是力，是反抗，是不可捉摸的飞动。

是的，拜伦的某些行为，是诡异得叫人不免皱眉头的。象他那种对于女性的卑视，对于游乐甚至虚荣的耽溺，便是一些例子。试读莫洛亚《雪莱传》的后半部，在他那明晰线条的显示下，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一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伦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冷遇和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多地倾注到象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来看，拜伦确实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他象一条铁索一样，牢牢拴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象雪莱那样，对他抱着一种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敬爱。几年前，当我在陀勒那部名剧《机器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伦勋爵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在意大利积极帮助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

形么？这和他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民族的古代文化和人民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是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是一样叫人心魂驰慕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伦当作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为，原是当时欧罗巴社会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和禀性等关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局限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尖锋，却已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受伤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象他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作艺术家看的拜伦不消说了，当作人看的拜伦，也是那么英雄卓特的！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

*

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作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好象也颇为强烈。他曾经以盼望产生俾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日本青年。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

他的文笔好象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物，

作为大众读物，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晓得它的。近来，好象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昧》。我自己是爱读他的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占据过我的案头的读物。就是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雄辩家，他便是其中的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演讲，我也曾经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都是去间接地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大抵是在那里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千里迢迢地到那个国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篋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爱读的唐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最澄（谥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台下人的耳朵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平常的道理用不很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地说，他是一个雄辩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知识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他的